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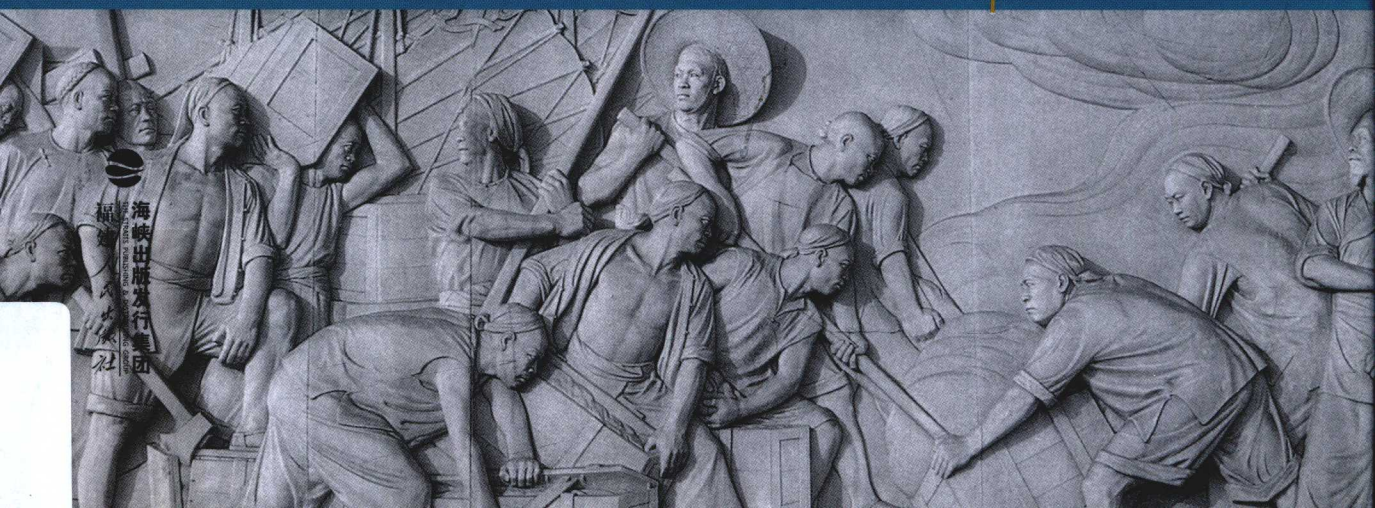
鸦片战争史

中国历史发展中第三次社会大变革研究

第二版

Yapian
Zhanzheng
Shi 上

萧致治 主编



鸦片战争史

中国历史发展中第三次社会大变革研究

第二版

Yapian
Zhanzheng
Shi

上



萧致治 主编

《鸦片战争史》第二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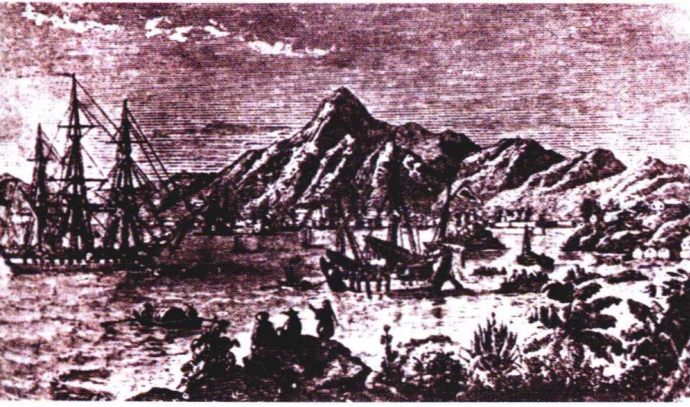
主编 萧致治

撰写 萧致治 第二章、第六章、结束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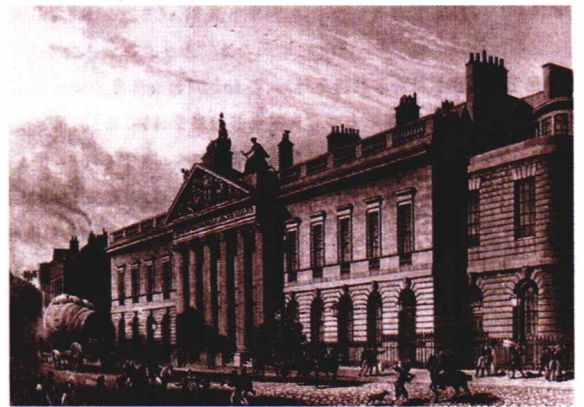
许增紘 第三章、第十一章、第十三章、第十四章

李少军 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二章

杨卫东 第一章、第四章、第五章



鸦片战争前的香港港口



英国伦敦东印度公司



虎门销烟池旧址



魏源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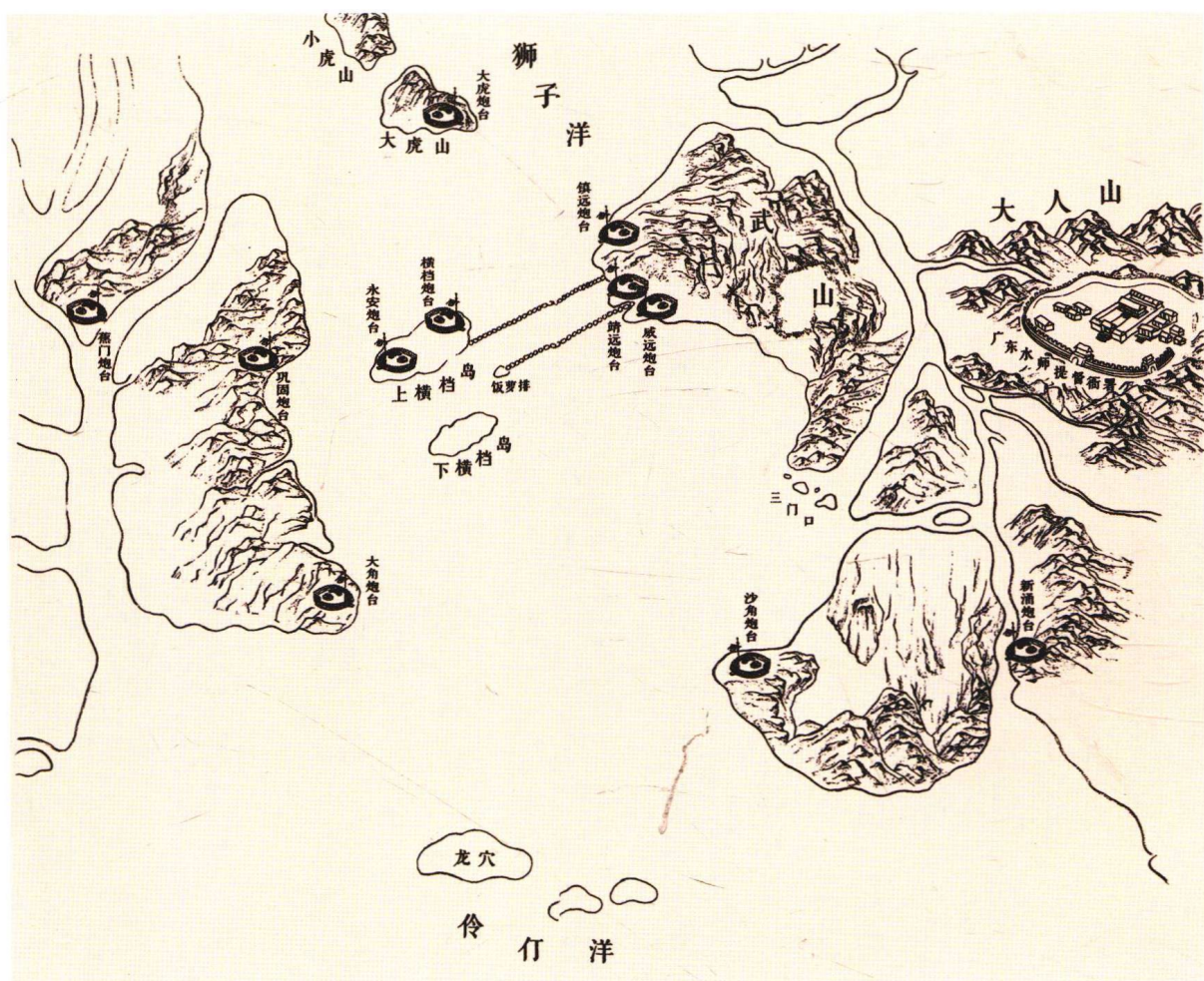
林则徐像

三元里西村南岸九十餘鄉聚義者為不共戴天逆黨
 英逆事照得向來英逆素不安分屢犯
 入朝昔攻沙角炮台戕害官兵我
 皇上深仁厚誼且示懷柔彼尚不知感思猶復包藏禍心
 深入重地亂炮火箭砲害居民攻及城池日無晷刻
 朕差大臣見城廂內外連環戰約戰兵安民英逆理宜得此
 好意即休胡乃貪勝不知輸得寸則寸容縱
 兵卒擾亂村莊搶我耕牛傷我田禾劫掠我祖墳法辱
 我婦女鬼神共怒天地難容我等所以奮不顧身圍
 義律於北門斬首百懸於南岸爾等逆黨執愚此時
 若非我府尊為爾解此厄各逆其得保首領以下諸子
 今爾等出亦當速降為將軍大人無功揚言於眾與
 百善中實其早視我此地無人實甚我等用是氣憤成
 志志除妖孽能德之義去發助兵糧餉之費天整聖
 利及務使兒子無以影留存先施無片能回國而後已亦
 到尔其卜日交戰為此將示



三元里人民討英檄文

关天培像



虎门炮台形势图



《怡良奏英人强占香港岛并出伪示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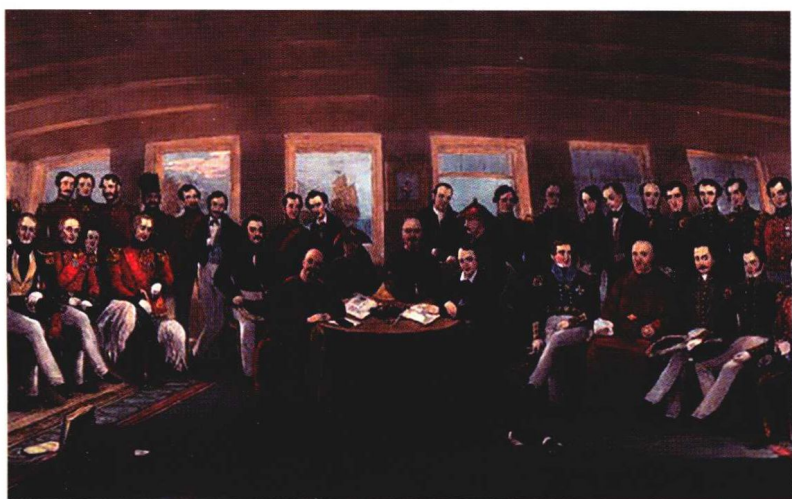
三总兵塑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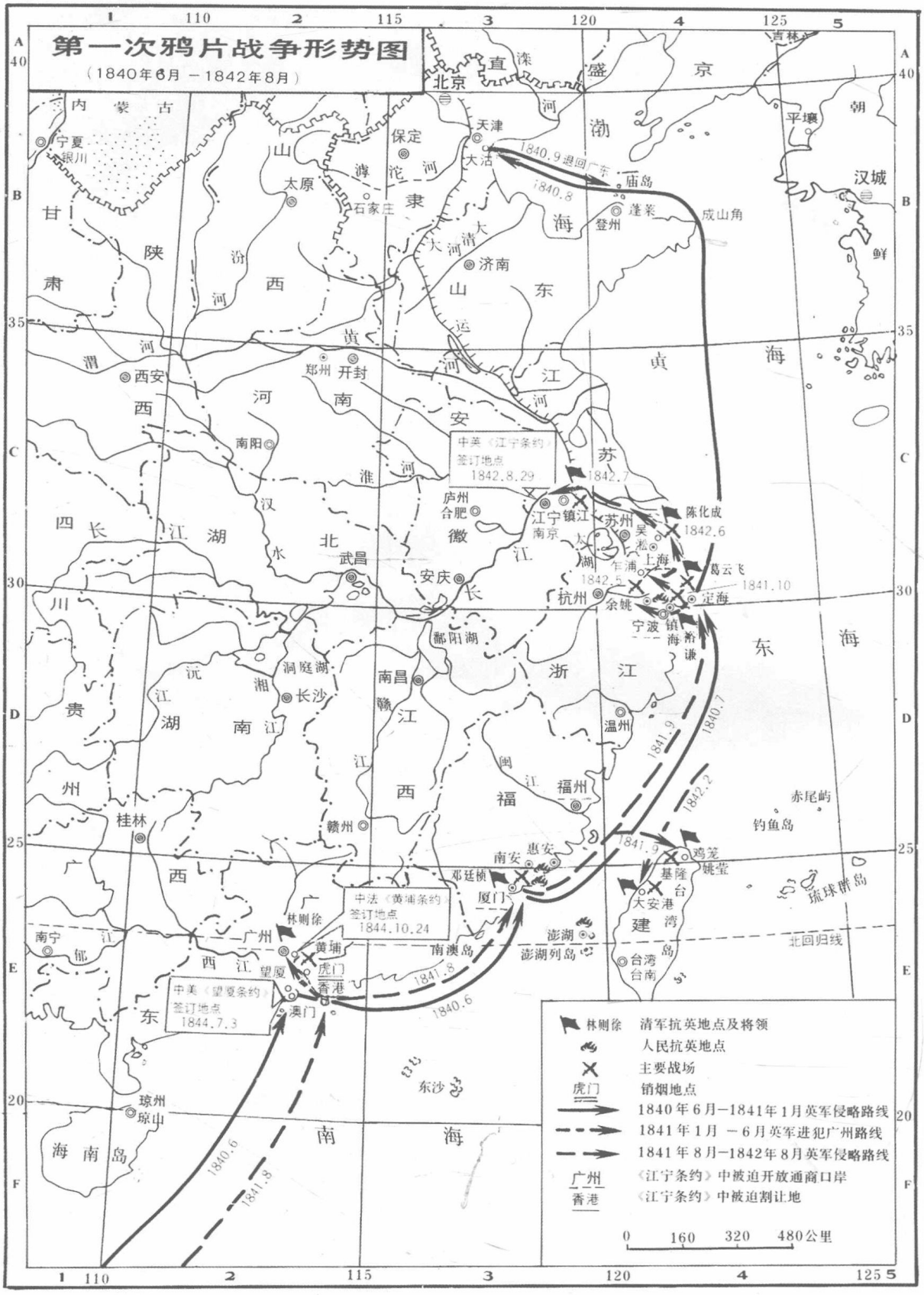
陈化成像



道光皇帝像



签订《南京条约》时的情形



第一次鸦片战争形势图 (1840年6月至1842年8月)

第二版修订说明

20年前，本书出版之际，正值鸦片战争中被英军强占的中国领土——香港回归祖国前夕，因而受到中央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中共中央主要领导同志通过中共福建省委告知福建人民出版社，点名索览。中国史学会会长戴逸教授在《推荐书》中，盛赞本书“对发生在19世纪中叶的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及其深远影响做了精心细密的研究。该书很有说服力地从多方面阐明鸦片战争是英国殖民者对外扩张侵略的必然结果，指出战争使中国遭到巨大的冲击，蒙受深重的损害，但也激起了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的爱国主义精神。此书搜集了很丰富的中外文史料，吸取了以往海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积累创新，历时十多年，带领几位中青年学者，勤奋工作，全力以赴，完成了这部著作。此书观点正确，文笔流畅，不少地方有所创新，是一部优秀的历史学著作，也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本书出版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新闻出版报》《近代史研究》以及香港《大公报》等16家报刊，相继发表评介文章，认为此书是“研究中国近代史开端的新突破”，“以其翔实史料作扎实基础，既充分吸收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又提出不少新见解”，“颇有说服力，令人耳目一新”，“将鸦片战争史的学术研究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是迄今为止篇幅最大的一部鸦片战争史，是目前鸦片战争史研究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重要标志，是一部水平颇高的学术专著”。“为这一课题研究开辟了新天地”，“对由鸦片战争引发的中国历史发展中第三次社会大变革作了精辟的阐述”，“堪称经典的《鸦片战争史》。这是一批有着强烈历史责任感的历史学家。他们为我们这个时期以及中华民族的后人留下一份警世录”。1997年9月，本书先后获得第六届“五个一工程”奖和第三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10月，又获华东地区第十一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图书一等奖。这部著作是我主持编著和翻译的六种研究鸦片战争著作〔包括《鸦片战争研究》、《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纪事》、《外国学者论鸦片战争与林则徐》（上、下）、《林钦差与鸦片战争》、《鸦片战争与林则徐研究备览》〕的总结性成果，能获得社会广泛认同，令我倍感欣慰。

20世纪80年代，在我着手编著《鸦片战争史》的时候，即曾设定编撰方针是，要“联系鸦片战争前后的中外时势，从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思想、中外关系等方面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考察”。但是，在中西关系方面，注意了经济、政治和军事方面，对中西文化交流有所忽视。为了弥补这个缺陷，趁此次新版之机，特重点补写了有关明清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内容，作为全书的第二章，叙述了明清时期近三百年中西文化交流的概况。关于这一时段的中西文化交流，前人已有不少成果，为我的编撰提供了基础。三十多年来又有许多著作相继出版或再版，其中特别是方豪的《中西交通史》、徐宗泽的《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李喜所的《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沈定平的《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吴孟雪与曾丽雅的《明代欧洲汉学史》、徐海松的《清初士人与西学》、张西平的《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熊月之的《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吴义雄的《在宗教与世俗之间》、黄见德的《明清之际西学东渐与中国社会》等，都是研究这一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精深之作，为我编撰这时段的中西方文化交流提供了很多方便，我从中吸取了他们的许多研究成果。

另外，本书出版后至今，有关这段时期的历史研究，也有一些重要的新成果，在这次新版之际，特做了一些补充：

1. 17世纪的中荷关系。荷兰是继葡萄牙、西班牙之后于17世纪前期称霸世界的海上强国，当时由于缺乏资料，除细叙了荷兰侵占台湾及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历史外，其他只能一笔带过，这次则对荷兰和清初中国的关系做了适当的补充。

2. 1833年珠海淇澳人民的抗英斗争。位于珠江海口的淇澳岛，是外国船只进入珠江的必经之地。外来商船经常在这一带停泊。到了19世纪初，英国商船即曾对此岛进行过勘测，并在淇澳岛的南端修建存货的简易栈房，还不时去岛上渔村抢劫财物。淇澳人民忍无可忍，就在1833年与英商展开了一次反对抢牛的斗争。英国档案馆还藏有当时双方交涉的往来文书。这是有确实记载，而且时间较早的一次广东人民自发反抗英国侵略的斗争，比1841年广州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要早8年。这次根据新发现档案材料做了补叙。

3. 英国全权代表义律和伯麦，在1841年7月的特大台风中险些丧命，1841年7月21日至23日，广东沿海遭遇了一次特大台风，香港一带受这次台风影响，损失异常惨重。在这次台风期间，义律和伯麦乘“路易莎”号由澳门前往香港。途中“路易莎”号被台风击破，义律和伯麦差点丧命并险被清军巡查船俘获。此事初版只简略提到英国舰队被台风吹得七零八落，不少船舰受损，

没有叙述义律和伯麦的遭遇，这次做了补充。

4. 1841年9月第二次定海之战英军的伤亡情况。第二次定海之战是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中英双方军事较量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中国方面三总兵和数千战士牺牲。英军的伤亡情况，英国方面的记载多讳言隐饰，中国的文献记载又失之笼统。近年因为在舟山发现了英军于1841年建的皇家五十五团死亡者的合葬墓，英文的碑文上明确记载这个合葬墓中葬了伍长和军鼓手13名以及士兵403名，共计416名。由此足以证明，英军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历次战役中，死亡人数最多的不是传统说的镇江之役，而是第二次定海之战。

5. 中英军事装备一节改写。过去介绍鸦片战争，对中英双方的枪炮等军事装备，因为缺乏具体细致的研究比较，叙述比较笼统。近年鸦片战争博物馆张建雄与河南科技大学刘鸿亮等，对中英军事技术、船炮等进行了深入调查与比较研究，使这一领域的研究较前深入了一大步。此次汲取了他们的成果，做了一些补充。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张建雄、刘鸿亮著，人民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鸦片战争中的中英船炮比较研究》一书。

6. 清代传统海防思想的研究。鸦片战争中清军连遭失败，除了诸多因素的综合影响外，其中海防观念缺失也是一个重要根源。过去对海防思想缺乏重视，因此常常被忽略。实际上，行动决定于思想。清军的节节失败，追本溯源，多与旧的海防思想有密切关系。为此，此次新版，略做了一点补叙。

7. 1856年9月鄂西北红巾军起义。1856年9月，正当太平军石达开率军与清军激战于武昌，北方捻军在河南胜利发展之际，湖北襄阳府的樊城以西一带爆发了一次农民起义，几个月之内队伍发展到2万多人，足迹遍及襄阳府、郧阳府、宜昌府，以及河南省南阳、邓州等地，清政府视为“心腹之患”。这次起义前后持续不到一年，但由于事件发生在中国腹心之地，而且适值以太平天国为首的农民大起义走向高潮之际，其影响和给予清政府的打击都不宜小看。笔者在1972年至1974年间，曾带领学生两次赴起义地区做过调查，并查阅了相关地区的地方志，汇编成《鄂西北红巾军起义资料汇编》，约计16万字（油印本）。这次起义一般历史教科书均未提及，特在本书中加以补充，算是拾遗补阙。

8. 嘉道咸时期的西学东渐。嘉道咸时期，也即19世纪前期，向中国传播西学的，已经不是天主教系统的耶稣会等，而是英国伦敦会等经过宗教改革的基督新教组织。他们除了通过和中国人合作大量翻译出版宗教与西方科技书籍外，还通过创办医院、兴办教会学校等方式来引诱华人入教，以及为侵略服务。中学西传已经淡化。

除了上述几项重要补充外，此次新版还对全书做了一次校改，书中的一些差错均做了改正，希望在质量上有所提高。由于新版增写了第二章《明清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从第二章起，编次有所调整。新版参加撰写初稿的编著者，变动如下：

杨卫东：第一、四、五章

萧致治：第二、六章，结束语

许增纮：第三、十一、十三、十四章

李少军：第七、八、九、十、十二章

此次新版，得到福建人民出版社领导和责任编辑的精心校阅，谨致以衷心的感谢！增补部分插图由鸦片战争博物馆提供，一并致谢。

萧致治

2017年1月21日于武汉大学

第一版序一

陈锡祺

萧致治教授主编的新著《鸦片战争史——中国历史发展中第三次社会大变革研究》一书，经过多年的惨淡经营，即将和读者见面了。我和事先有幸拜读过书稿，或者是对萧教授这项工作有所了解的各位朋友，都感到十分高兴。

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无论在中国历史上还是在世界历史上都有很重要的地位。毫无疑问，鸦片战争史是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在鸦片战争结束不久，关于这场战争的著作已经出现了。一些参加过侵略战争的英国军官写书记述了自己在这次战争中的经历。这些侵略军军官的回忆录，对日后的研究是很有参考价值的，但不能说是完全真实地反映了鸦片战争历史的著作。几乎与此同时，几位正在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中国士大夫，满怀爱国激情撰写了关于这场战争的著作。最早的要数著名的学者魏源，当战争的炮声还在轰鸣时，他已在根据亲身的经历和见闻，撰写《道光洋艘征抚记》（又名《夷艘入寇记》《夷舶入寇记》《夷艘寇海记》等）。这部书简明扼要地概述了鸦片战争的经过，揭露英国殖民者的侵略罪行，鞭挞妥协派的误国卖国，歌颂爱国军民的反抗斗争。由于当时妥协派还掌握着军政大权，所以，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刊刻的《圣武记》一书只把《道光洋艘征抚记》列入篇目而没有收录正文。这部中国最早的关于鸦片战争的史著，仅以不署名的抄本流行于世。稍后，梁廷枏撰写的《夷氛闻记》，也是由于同样的原因刊行时没有署名。同治年间刊行的《中西纪事》，曾以大量的篇幅记述鸦片战争的始末，但刊行时作者夏燮把真名隐去，只署江上蹇叟。

魏源等人关于鸦片战争的著作完全是用中国传统的史学研究方法写成的。这样说，并不会贬低这些著作在近代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到了20世纪，引进一些新的历史研究方法并以“鸦片战争”为书名的著作陆续问世，先后有刘彦的《鸦片战争史》（1911年）、武培幹的《鸦片战争史》（1931年）、丁晓光的《鸦片战争》（1934年）、姚薇元的《鸦片战争史实考》（1942年）等书。50年代

以后，又有多种鸦片战争史出版，从1950年到1972年，共出了13种，但全部是篇幅不大的小册子。在一些中国近代通史著作中，如萧一山的《清代通史》、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册、戴逸的《中国近代史稿》第1卷、林增平的《中国近代史》、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苑书义等的《中国近代史新编》，对鸦片战争都有很有分量的论述。在我国的台湾省以及其他国家，在这个时期也出版了若干鸦片战争史著作，如增井经夫的《鸦片战争与太平天国》（1955年、1978年）、韦利的《中国人心目中的鸦片战争》（1958年）、张馨保的《林钦差与鸦片战争》（1964年）、霍尔特的《中国的鸦片战争》（1964年）、姚廷芳的《鸦片战争与道光帝、林则徐、琦善、耆英》（1970年）、陈舜臣的《鸦片战争实录》（1971年）、费伊的《鸦片战争（1840—1842）》（1975年）、比钦的《中国的鸦片战争》（1976年）、颖里士的《鸦片战争》（1976年）、谭中的《中国和勇敢的新世界——鸦片战争的起源研究》（1978年），尽管在50—60年代，在我国大陆整理出版了一批对研究鸦片战争来说是极为珍贵的史料，如《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等书，但是，没有一本能反映我国学者研究水平的鸦片战争史，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自70年代末以后，我国的学术事业开始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在鸦片战争研究这个领域，也是硕果累累。除了大量论文之外，还出版了牟安世的《鸦片战争》（1982年）、陈胜彝的《林则徐与鸦片战争论稿》（1985年、1990年）、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1995年）等一批在学术上颇有分量和新意的著作。在国外，则有矢野仁一的《鸦片战争与香港》（1939年、1990年）、普赖茨克的《内部的鸦片战争》（1992年）等书。此外，在广州、福州等地，举办过一系列研讨鸦片战争、林则徐或其他相关问题的学术研讨会。中外学者在会上展开热烈讨论，促进了鸦片战争研究的进一步深入。现在，萧致治教授新著的出版，毫无疑问是当前鸦片战争史研究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的重要标志。

《鸦片战争史——中国历史发展中第三次社会大变革研究》是66万言的皇皇巨著，附有地图和图片30多幅，可说是迄今为止篇幅最大的一部鸦片战争史，而且是一部水平颇高的学术专著。

首先，这本书是在丰富的资料基础上写成的。一部史学著作，尤其是像研究鸦片战争史这类涉及中国与外国复杂关系的著作，如果没有丰富的中外文史料做基础，就很难期望能全面、深刻地反映历史的真实。以往中国学者研究鸦

片战争，外文资料利用得较少；反之，外国学者研究这段历史时，对中文资料的利用也难免有缺。但萧教授这本书，在收集、考证、利用中外文资料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例如，以往的著作叙述禁烟运动时，多数偏重谈广东禁烟的情况，其他地方就只是简略介绍甚至一笔带过。本书则充分利用了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关于 1839—1840 年各地禁烟的资料，因而对禁烟运动以至对鸦片战争爆发前的中国的论述就更加全面。在对很多事件的论述中，正是因为注意到吸取中外史料并加以综合比较，读者可以通过这些论述，对事件以至发生这些事件的背景获得更接近历史真实的了解。

第二，这本书广泛吸收中外学者的成果，研究的视野广阔，角度新颖。作者并没有把鸦片战争仅仅看成是中英两国之间发生的一场战争，而是把这场战争看作是中国历史发展中带转折意义的重大事件。它标志着一个历史时期的结束，同时又标志着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开始。因此，本书除了用 4 章翔实地论述鸦片战争的经过外，前面用了 5 章详细叙述鸦片战争发生的根源和历史背景，即战前 300 年的中西关系、世界发展大势、中国和英国的社会状况等，后面又用了 4 章论述了鸦片战争带来的后果和影响。鸦片战争既被置于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又被置于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范围里加以考察，对经济、政治、军事、中外关系、社会文化等各方面都做了比较深入的分析。书中既简明扼要地叙述了战前 300 年中西关系的发展变化，又突出了英国在“侵略的西方”中的主角地位；既从各方面分析了清朝统治的衰败，又对英国的社会状况做了必要的叙述。本书既重视宏观的研究，又重视微观的分析，结构严谨，主线清晰，论点鲜明。这样，鸦片战争发生的根源、战争的进程与结局及其产生的影响，就得到了全面的阐明。

第三，本书作者不囿于成说，从详细占有资料入手，对很多重大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例如，对诸如西方人同中国的早期接触、鸦片战争前清政府的对外政策（即通常所说的“闭关政策”）、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对鸦片泛滥问题的态度、鸦片战争开始的时间、英国对侵华战争的准备和决策、清政府在战争全过程战略和政策的变化以至战争中一些战役的具体过程等问题，国内外学者往往众说纷纭。本书作者或在综合分析诸说之后，经过考究，择善而从；或对前人的研究做出重要的修正与补充；或提出了与前人不同的独到之见。这样，就使本书的论述与结论有充分的说服力，令人读后有耳目一新之感。

从这部著作，我们可以看到作者的识见和功力。我认识萧教授已 40 多年了，他于 1956—1960 年在中山大学历史系学习，担任系学生会主席。其饱满的

工作热情和勤奋的学习态度，当时就予我以很深的印象。毕业后他到了我的母校武汉大学工作，从事的又是中国近代史的教学与研究。我们因为是同行的关系，有不少机会联系和见面。他曾对我谈过自己的研究工作，我也为他所取得的新成果感到高兴。萧教授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好几个领域都颇有造诣，而对鸦片战争史的研究，着力尤多。有好几年，他协助姚薇元先生主持有关鸦片战争的研究课题，成绩显著；姚先生逝世后，他继续进行研究工作，成为武汉大学鸦片战争史研究的学术带头人。他还组织人力，把国外一些研究鸦片战争的文献翻译出版。当知道萧致治教授主持撰写鸦片战争史时，我就认为他是很恰当的人选。这部著作的完成，是他几十年孜孜不倦地研究鸦片战争的总结，也是他对中国近代史研究这个学术领域的重要贡献。可以预期，这本书出版之后，将会在学术界受到欢迎和重视。

而且，这样一部高水平的研究鸦片战争史的专著，在1996年出版，除了在学术上有重要意义之外，还有不寻常的现实意义。因为在1997年7月1日，英国通过鸦片战争强占的中国神圣领土香港，将要回到祖国怀抱。读者通过这本书重温150多年前的历史，将会加深对中国国情的了解，进一步激发爱国热情，为把祖国建设得更强大，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更加尽心尽力。因此，这部巨著可说是对香港回归祖国的一份重要献礼。

任何一部学术著作都不会尽善尽美，萧教授的这部著作恐怕也难例外。但萧教授是一位勤奋而谦虚的学者，在本书出版之后，他一定会继续与同行交流切磋，继续对有关鸦片战争的学术问题钻研探索。我期待萧教授取得更多的新成果。

1996年12月于中山大学康乐园

第一版序二

章开沅

武汉大学历史系是我国鸦片战争史研究屈指可数的重镇之一。已故姚薇元教授所著《鸦片战争史实考》，学风严谨，功力深厚，堪称开创之作。其后萧致治先生来武大任教，除研究辛亥革命成果斐然外，也致力于鸦片战争史的深入探索。1982年，姚、萧两位先生决定合写一部鸦片战争的大型专著，并从搜集、考订、分析中外史料入手，首先针对薄弱环节和重点问题开展专题研究。1985年，姚先生赍志以歿，但萧先生和几位年轻教师仍然继续从事此项研究。1987年出版的《鸦片战争研究》（论文结集），便是他们的重要研究成果。在此前后，他们还编辑出版了《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纪事》（以80万字的《鸦片战争前后史事纪要》书稿为基础）、《林钦差与鸦片战争》和《外国学者论鸦片战争与林则徐》（上），为本书的撰写提供了坚实的前期基础。以后又经过6年的漫长岁月，才完成这本《鸦片战争史》的定稿。即此一端已可见著者用力之勤与探究之深，与时下某些率尔操觚的应景之作不可同日而语。

本书副标题是“中国历史发展中第三次社会大变革研究”。作者的意图很明显，从纵向而言是把鸦片战争放在中国4000多年历史长河中做连贯性动态研究，从横向而言则是把鸦片战争放在当时世界环境和中国社会历史的总体中间做不同层面的剖析研究，而总起来说就是在“通”字上下功夫。这样就打破了过去把鸦片战争当作单一政治事件研究的陈旧格局，为这一课题研究开辟了新的天地。

本书对资料搜集下了很大功夫，除中外档案文献外，还查阅了许多当事人记述、主要官书、相关方志和其他各种重要资料。同时又很重视资料的鉴别与考订，并非有闻即录，而是力求避免以讹传讹。例如广东《新安志》中有明正德元年（1506年）佛郎机人占屯门海澳的记载，恰好与布赖克利斯《中国与远东》一书“法国人于1506年最先来中国”的说法相吻合，不同于1517年葡萄牙人最先来华的传统论点。作者经过详密论证，认为“佛郎机”为当时中亚人

对欧洲人的泛称，并非专指“法兰西”。法国在16世纪初甚少海上活动，不可能先于葡萄牙来华，布赖克利斯可能是把“佛郎机”误认为就是“法兰西”，因此仍以维持葡萄牙1517年最先来到中国这一传统说法为宜。

作者重视吸收以往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但是更立足于自己的独立研究，勇于做进一步探索并形成新的见解。例如对于弛禁、严禁两派的区分，就不囿于过去长期沿袭的成说，而是根据历史实际做更为客观细致的论述。对于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也不是单纯歌颂赞扬，而是力求实事求是地剖析其局限性，并且比较全面地总结其历史经验。即使是对于西方殖民主义的侵略，也是根据历史发展的具体情况加以恰如其分的论述。如第一章第二节的标题是“葡萄牙窃据澳门”，用“窃据”而不用“强占”，就是因为当时的明朝不同于19世纪中叶的清朝，当时的葡萄牙也不同于三个多世纪以后的英国，不能用近代“侵略—妥协”模式硬套300多年以前的历史，而葡萄牙占领澳门确实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最近在澳门访问时，当地有的学者即不满于内地某些学者对早期澳门史的简单化表述，他们认为当时葡文档案所陈述的一些实际情况也应该作为参照。我想本书作者的客观态度与精辟论断当可赢得众多海内外学者的共识。

当然，对本书的最好评价应该是广大读者的直接反应，无须我在这里唠叨。不过致治盛情交读，又值薇元前辈九二冥诞，而香港即将于1997年回归，一扫百余年来之国耻，抚今思昔，感慨万千，聊缀数语，或可充序。

1996年12月于桂子山